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上海作为方法

——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曾军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 平

上海作为方法

——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曾 军 孙晓忠 苗 田 葛红兵
许 峰 曹 谦 邓金明 陈 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曾军等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7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忻平主编)
ISBN 978-7-5671-0149-4

I. ①上… II. ①曾… III. ①现代文学—文
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620 号

责任编辑：焦贵平

封面设计：张天志

版式设计：施義雯

技术编辑：金 鑫 章 斐

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曾 军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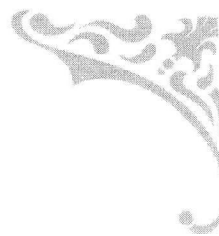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印张 20.25 字数 335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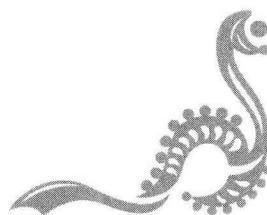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71-0149-4/I·158 定价：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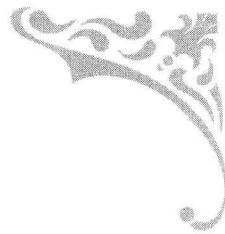


本研究受上海大学“211 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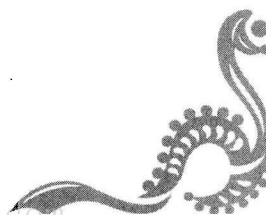
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

(A.15 - A011 - 09 - 001) 资助，谨致感谢！





**本研究受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
建设“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
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资助，谨致感谢！**



总 序

忻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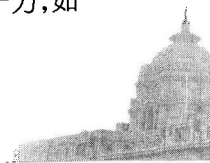
一

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上海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课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生态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它吸引了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研究多集中在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讨论上,近年来对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也已开始多起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国家/社会、主流/边缘等多种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交融竞争,使民间文化生态更趋复杂,也引发以“信仰/价值的缺失与重构”为核心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求研究视野更多地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民间社会的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理与总结,其社会转型中引发出的问题,也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前提下谋求解决之道。

以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了漫长的社会转型。不仅史学界以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人文社科各学科也以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为重大问题。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已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更确切的含义,包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等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

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当代社会转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如



今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不应回避的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作出了“社会溃败”的悲观判断。中国发展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发展走向也是合理的。然腐败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也已充分暴露。可以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时期。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努力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文化自身的状况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实际事关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其后开始关注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并认为这种关联性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因此文化生态被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不容乐观,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不断地吞噬着地方的传统文化,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导致文化受到污染。通俗文化的强势和精英文化的缺失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匮乏,只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从而造成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信仰失落等一系列负面后果。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必须修复文化生态的平衡。这既要靠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实现全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从而达到文化生态的和谐。

人文基础学科有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本项目从城乡社会生活、文化生产、信仰与价值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研究“转型

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通过科学地认识转型期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间文化生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知识基础、话语体系和决策参考。

城乡生活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基础,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关心的前沿问题。本领域的研究结合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演变。但已有的相关成果多集中在古代及大城市研究上,对近代转型期的城乡社会生活的比较及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生态的互动关注明显不够。这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城乡社会生活变迁引发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急剧变革的现实是不对称的。有鉴于此,我们将“近现代城乡生活与文化生态”列为本项目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如何改造与重建城乡文化生态为出发点,研究城乡生活与中西文化、乡土文化与民间精神、方言与地域文化,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代谢,揭示其中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因素的衔接、冲突与竞争,试图找出影响构建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生态中的核心问题与应对之策。

对中国民间文化生态得以生成、运行与传播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对文化生产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马克思。国外学者韦伯、阿多诺、鲍德里亚等纷纷从现代性、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等多种维度展开了对文化及其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国内有关文化生产机制的提法最早由王晓明教授提出,将生产机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探讨中国当代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历史条件和资源,将有力地推动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将“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及国家策略”列为本项目的另一个方向。该方向关注当代日常生活文化、文化传播机制、文化观念/意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的思想与文化等内容,研究正在形成的文化状况及其生产机制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参与新的文化现实的构建。

信仰多样性及其认同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合理构建的核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渗透与竞争产生了民间的信仰多样性的局面,使得信仰及其认同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分析民间文化生态中信仰多样性的现状及原因,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寻

求和建设民间社会共同价值认同和国家对信仰问题的有效治理与引导。因此我们将“信仰多样性的民间认同与政府管理”作为本项目的第三个方向。该方向从宗教信仰与民间社会认同、当代宗教与社会转型、知识及价值与主流信仰等问题研究入手,探讨转型期社会信仰多样性及民间社会基本价值认同的状况及变化,为和谐社会下民间信仰体系建设提供知识和决策参考。

二

自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海内外学者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上海学”的概念,用以强化上海研究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地方高校,早在80年代便向本科生开设了“上海学”课程。本项目课题团队依托上海大学的这一传统优势,将上海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经过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得以出版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概言之,本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其时间脉络的完整性。本丛书的关注点从上海文明的古老源头一路延伸到当代。张童心近年对上海及其周边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他参与主持的广富林遗址最新考古发掘,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史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崔志伟的《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对元明之际松江文人群体的来源、交游、政权更替下的文人心态、文人创作题材与形式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刘蕾从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入手,展示了归有光在嘉定文坛地位的确立及思想的传承过程,探究了明清之际归有光文坛地位发生转变的原因。忻平的《危机与应对: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一书把视线拉到近代。通过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下上海市民各阶层群体和组织、不同领域和生活方式的多维考察,展现了危机时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及民间应对方式。王光东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一书,以张资平、茅盾、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为个案,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上海的想象方式以及产生的原因,阐明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及其内在关系。王晓明的《今日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则进一步将目光

定格在当下的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考察它与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关联。

第二是关注民间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的日常性。陶飞亚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上海世俗生活》便从历史的移动中展现基督教宗教东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这样一个见微知著的历史命题。王晓明对当前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也是从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忻平主编的《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更是展现了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面相。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性。多学科意味着多种学术探讨的方法,本套丛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学科视角,更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借鉴。如蔡翔和董丽敏等著的《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就是运用了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媒介两个视角,考察上海文学叙事过程文化观念形成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重构,分析由此形成的上海符号和符号体系。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直接针对性。本丛书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上海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新的探索。曾军等著的《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集中反映了这一关怀和努力。此书意在以上海为方法,去充分展示“中国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深刻揭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同时通过反思性、批判性的维度,来探索一种上海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本书构思宏大,内容丰富,囊括了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运动、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文化制度变迁以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

第五是学术关怀的当代性,即注重当代上海的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吕建昌的《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文博事业的角度审视历史上世博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进而扩展到世博会对城市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影响,博物馆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世博后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走向等问题。本书提出了上海世博会后续“文化效应”的概念,为全面、客观评估世博会对举办地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雷洪波的《移民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语言接触》是对当前上海正在发生的语言接触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当前城市背景下移民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态度等相关问题,从语言接触中的另一方——移民的角度出发,反映语

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现实。王天恩的《历史逻辑与主流信仰——以上海市情为背景》从哲学的层面对当前上海的主流信仰进行了剖析，无疑也体现了本团队强烈的现实关怀。

丛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青年新锐。丛书得以付梓出版，是多年来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作为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很高兴承担这个编辑工作，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由于时间仓促，丛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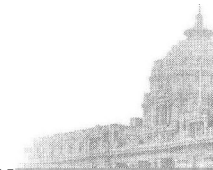
一、“上海学”的旧话重提

2003年8月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短评《慎提“上海学”》,文章以上海某高校开设“上海学”课程一事为由头,对“上海学”的提法提出商榷,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研究方法,否则它就不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以此为标准,“上海学”显然就是将上海地方志、文化史、社会学和民俗学等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①《解放日报》的这则短评反映了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学界对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动辄打出“某某学”的学术创新、学科建立的热情的警惕,这恐怕也是长期以来“上海学”并不那么显眼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上海学”的倡导要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在1980年,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的江闻道先生就提出“上海学”的问题,在他看来,

“上海史研究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不是一朝一夕能弄清楚的。外国人问起上海的历史,我们回答不明白,现在的小青年更谈不出。因此,我们要把有关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妓女情况都要一条线、一条线地理清楚。有些知道上海历史的人,要去拜访,抢救活的资料。文字资料方面,党史记载,反面记载,都要翻出来整理研究。我们要研究上海经济命脉,研究‘冒险家的乐园’是怎么形成的。外国输入品的历史也要调查研究清楚。这和文化侵略也

① 王多. 慎提“上海学”[N]. 解放日报, 2003-8-6.



有关系。总之，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①

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学”的背景是1980年7月，上海学界对成立上海史研究会的讨论。而江闻道的“上海学”也就是“将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②

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唐培吉教授为此举办“首届上海学研讨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上海市社联主席罗竹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上海市党史征集办主任陆志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胡道静、复旦大学副校长庄锡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吴修艺、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李庆云、上海大学副校长杜信恩等均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其发言的所有文章均刊载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3期上。1987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也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新学科”中增设“上海学”辞条，对“上海学”进行了概括：

“这是一门以‘上海’命名的新学科研究。它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振兴上海的理论、方法为该学科建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结果，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分支学科基础上，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外部(包括国际和国内其他省市)的联系，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上海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目前，该学科研究还处在构架阶段。”^③

一时可谓盛况空前。

不过，时隔10多年之后，1999年的《史林》杂志举行“上海学笔谈”，刊载了唐振常、姜义华、沈渭滨等人的文章，唐、姜两位一方面承认上海城市研究的独特意义和价

① 江闻道语[J]. 上海史研究通讯. 第1辑, 1980年.

② 熊月之. 上海学平议[J]. 史林, 2004(5).

③ 张绶. 新学科 上海学研究概况[M]//刘振元. 上海文化年鉴[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79.



值,但都认为不应急于成立上海学,而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多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

2003年,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正式启用“上海学”的提法,熊月之还分别撰文《上海学平议》(《史林》2004年5期)和《海外上海学研究透视》(《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为“上海学”的合理性正名。

其实,围绕这“上海学”三十多年的赞成与反对,其共识大于异议。何以见得?首先,大家都认为“上海”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值得研究。其次,大家都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研究”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基础,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再次,“上海城市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推进“城市研究”,甚至“中国研究”的材料、问题以及研究范式。所不同的只是是否要用“上海学”这一给人以学科化的命名方式。即使是这种命名方式,赞成者内部经过二十多年的变化,也已做出重要的调整:即,从江闻道先生所倡导的“上海学”(Shanghaiology)到熊月之教授所强调的“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

熊月之的“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的命名方式来自于“中国学”(China Studies)以及与之相类似的西方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其研究特点在于:1)以某个特定的区域、地方作为研究对象;2)采取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综合性的研究;3)并不刻意强调“学科化”倾向,而是努力保持“问题化”立场。正因为如此,熊月之将江闻道所主张的以“上海史”为研究对象的“上海学”(Shanghaiology)改造成以“上海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上海研究”。在他看来,

“上海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一个城市,她与中国其他城市很不相同,确实有着很多值得研究的独特的特质;另外,上海学在学术界不是能不能,而是实际上已经聚焦起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力量。所以,我认为上海学这一名称是可以成立的。”“在学术界已经存在着与上海学相类似的城市学。……无可否认,以一个城市特别是以城市的历史、文化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由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内涵所决定的。”^①

^① 熊月之. 海外上海学研究透视[M]//朱政惠. 海外中国学评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3-42.

如果用熊月之的“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观点来看,这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这十多年来围绕上海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化都市化进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以上海为对象或中心的城市社会研究、城市管理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市美学研究……已确实实地成为一种不可小视的研究倾向了。

二、区域研究方法论反思：从作为“对象”到作为“方法”

不过,无论是“上海学”(Shanghaiology)还是“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其实是“上海研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将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的规律、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无论其所持的立场为何,无论其所采取何种方法,只要“上海作为对象”,就有了成为“上海学”(Shanghaiology)或“上海学”(Shanghai Studies)的前提条件了。

但是,仅仅凭借对象的共识就能够确保研究的共通了吗?当代学术的发展正越来越强调对学术自身逻辑前提及其方法论的反思,这种强烈的“自反性”(reflexivity)意味着我们要特别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赖以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立场、标准,甚至情感态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不是天经地义的,都是经过特定的逻辑和结构建构起来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已有的研究对象、方法、立场、标准、情感态度,包括结论,都可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可能被颠覆;如果我们具有了这种“自反性”,我们就无法在此时此刻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持特别肯定的态度——我们的研究一定是怎样怎样的,我们的看法确定无疑的是怎样怎样的。从词源学来看,reflexivity由两部分组成,“re-”的意思是向后、反对、反向的意思;而“-flectere”则是弯曲的意思,因此,reflexivity的本意是“反向弯曲”,因此,在我们的汉语译名中,除了翻译成自反性之外,它还往往被译成反思性、反身性、反射性、返身性,等等^①。这种对自反性的强调当然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过,不要简单将这理解成虚无主义、怀疑主义,认为学无立场、术无定规了。以现代性研究中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为例,它并非简单地所谓“非现代化”、“反现代化”那样可以简单贴上标签的。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自反性现代化’指

^① 肖瑛.“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5(2).

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作者特别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强化我们对这种“自反性现代化”的认识^①,认为“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②也就是说,“自反性现代化”提示我们注意,当我们面对某种共识的甚至成为常识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千万别忘记了,它同时在生产着另一种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正在抽离、重组,甚至掏空原有的现代性。

而我们的“上海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研究其实同样正在经历着这种自反性过程。

对“中国学”、“西方学”、“东方学”、“上海学”等类似的“区域研究”进行的自反性思考首先来自“身处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学者”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萨义德开篇即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而“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东方消失”的过程中,也许东方人正在经历着痛苦的抉择,但这些却并非欧洲人所关心的问题,“这位欧洲来客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③萨义德将之命名为“东方学”(Orientalism),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习惯性地将其译为“东方主义”。他强调的是“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或“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中的某种倾向,尤其是“东方研究”中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强调。因此,当萨义德用“东方学”(Orientalism)来强调对“东方研究”(Oriental

① 即,“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 再造政治: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M].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5.

③ [美]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三联书店, 1999: 1-2.

Studies)中权力话语的动作机制时,我们不难发现,萨义德已经开始进行一种“自反性东方研究(学)”的学术努力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提醒我们,当我们进行某种地域研究时,我们自己的学术立场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正在成为某种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某个区域,如上海、中国、东方、亚洲、西方,等等)在哪些方面是现实的问题,哪些方面又是想象的产物?萨义德的这种研究思路为我们反思“中国学”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如胡明扬就认为,“中国学是为美国的扩张战略服务的,所以中国学不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而只关心当前现实的中国社会,而且只关心中国社会落后的一面,甚至只对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感兴趣,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①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不完全支持这种将“美国的中国学”妖魔化的做法,但其对“国学”、“汉学”、“中国学”之间在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以及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对“中国学”背后的“东方主义”倾向的批判也是有警醒作用的。这种对区域的想象、表述及其权力动作机制的研究在“上海研究”中其实也已有成一定的气候,即以“上海想象”为标志的研究范式。不过,它并非萨义德式的具有反思性的学术研究,而是更多被转化为一种新的研究对象——文学、影视、美术等艺术是如何想象上海或者建构我们对上海的想象的。

其实,早在萨义德之前,来自东亚的学者也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有所反思了。这就是以“作为方法”为代表的一批日、中、韩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直到现在都在持续进行的学术努力。早在1966年,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就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不过,“作为方法的‘亚洲’”在竹内好那里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发,而只是一种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自我反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但却并不知道这种独特的东西是什么,“恐怕这样的东西作为实体并不存在。但作为方法,也既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应该是存在的。”^②此后,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孙歌的“作为方法的日本”、陈光兴“东亚作为方法”以及包括近年来所谓“批判性东亚话语”继续沿着这一反思性思路前行。其中,真正对“作为

① 胡明扬. 国学、汉学、中国学[J]. 南开语言学报, 2009(2).

② 竹内好. 作为方法的“亚洲”[J]. 中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07(66).